

唐代閩詩所映現的邊陲視域與 黎元家園

廖美玉*

〔摘要〕

全文分別從唐代閩宦與閩人北宦的不同視域、唐詩中關涉閩地去來的多重記憶、邊陲視域中的黎元／家園與詩歌四個面向加以探究，特別是閩人北宦與避胡入閩的不同記憶，以及閩人北宦與仕閩者交互映現的閩地書寫，由充滿對「異方」的疏離感，到彼此相激相成、共同騰驤，對閩人自我定位之啟發。而閩地詩人的邊陲視野，映現在邊陲戰爭中浮現的黎元、在荒服中營建的家園風景、以耕讀形塑的詩意家園三方面，從人民生存權的角度，分別開拓出「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黎元視角，鐫刻成「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閩夢裏人」的最深邃歷史印記，更以珍惜自然資源而使海山險阻成為大塊風景，以躬耕讀詩書打造一個自足家園，成為爭王圖霸的中原紛擾之外的詩意生活空間。

關鍵詞：閩詩、荒服、邊陲視域、黎元、家園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漢唐文學傳統係以京城為核心的思維，漢〈古詩十九首〉已有「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的邊陲之思，唐太宗雖有愛夷狄如一的宣示，畢竟無法改變「西北絕漠，東南窮海」的邊陲位置。本文為筆者〈浪跡窮荒——唐代詩人的邊境書寫與天下想像〉一文的進階討論，¹擬以「東南窮海」的閩地為考察對象，探討邊陲視野與詩意家園的生成。

唐前文獻有關「閩」的記載，為數不多且不明確，如《山海經》第十〈海內南經〉記載：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甌居海中，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鄩山在閩西海北，一曰：在海中。²

形容簡略，地理位置尚難確認。依晉郭璞注，甌即東甌，閩即閩越，指臨海永寧縣與建安郡，都在岐海中。至於在閩西海北的三天子鄩山，在新安歙縣東，傳說黃帝曾遊此地。至於《周禮·夏官》所稱「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的職方氏，要周知其「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及其利害，也僅提及「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的稱謂，³缺乏具體描述，而《爾雅·釋地》所稱「四海」更只剩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⁴七閩、九貉都不見了。司馬遷《史記·東越列傳》首度紀載閩地人物與建設，云：

¹ 詳見〈浪跡窮荒——唐代詩人的邊境書寫與天下想像〉，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編：《詩話學》第11輯（2012年6月），頁165-194。

² 晉·郭璞注，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頁267-268。

³ 漢·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夏官·職方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頁498。

⁴ 晉·郭璞注，邢昺疏：《爾雅·釋地》（《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頁113。

閩越王无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駟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漢擊項籍，无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无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⁵

越王句踐之後无諸，以佐漢有功被立為閩越王，建立了閩地第一個都城東冶。惟依班固《漢書·高帝紀》所錄詔書云：「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⁶則秦以前閩地應已有社稷血食。復依《史記》所載：「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⁷由於地理位置上的偏險難治，遂以強制移民的手段使閩越地區終止發展。是以東漢許慎所定義的「閩」字，被納入東南越的蛇種，⁸完全看不到文明的印記。唐開元十八年（730）釋智昇編撰《開元釋教錄》猶稱：「閩州，越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種，有五姓，謂林、黃等是其裔。」⁹建州為唐武德四年（612）所置，依此記載，唐初當地居民仍以「蛇種」的原住民為主。

事實上，閩地的偏險邊陲位置，反而成為中原戰亂的避禍之地。成書於德宗貞元 17 年（801）的杜佑（735-812）《通典》，明確記載著：

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¹⁰

合越而言，由於僻處邊陲、險阻難撫的「憑山負海」地理特性，反而使閩地少受政戰干擾，得以延續顏、謝、徐、庾的吟詠風流。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命

⁵ 漢·司馬遷：《史記·東越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卷114，頁2979。

⁶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卷1下，頁53。

⁷ 漢·司馬遷：《史記·東越列傳》，卷114，頁2979。

⁸ 漢·許慎：《說文解字》：「閩，東南越，它種，从虫門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年），頁680。

⁹ 宋·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70〈州郡部十六·江南道上〉，頁960。

¹⁰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182〈州郡典·古揚州下〉，頁4850。

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於〈州郡部·江南道上〉的建州、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共徵引了《十道志》、《方輿志》、《圖經》、《福州圖經》、《開元錄》、《郡國志》等書，除前引《開元錄》的「蛇種」之說，另引梁載言（691?）《十道志》有云：「泉州……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晉安郡。」¹¹可見唐初對於閩地的認知仍極分歧。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收錄唐人林謂《閩中記》、黃璞《閩川名士傳》、佚名《福州圖經》、《建州圖經》、《龍溪縣圖》五種，惟存文未見永嘉時中原士民入閩的相關記載。¹²

現存最早閩地方志為宋梁克家（1128-1187）《三山志》，序中即指出：「予領郡暇日，訪無諸以來遺跡故俗。聞晉太康既置郡之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記，又四百五十六年至唐，郡人林謂復增為之，皆散佚無存者。」並以「往昔之事，不可復記」為常恨，為「使四方知是邦於是為盛」，搜求務盡，以致傳聞多成事實。此後的閩地方志，除了明黃仲昭撰有《八閩通志》，清代更編纂有四部《福建通志》，清亡後陳衍更主纂的《福建通志》，號稱最為完備。至於範圍更集中的縣志、姓氏志，在「使四方知是邦於是為盛」的前提下，傳聞與史實摻雜難辨，以致於相關資料雖多，反而模糊了歷史真相的探求。¹³因此，陳衍在補訂鄭杰輯《閩詩錄》時，作〈補訂《閩詩錄》敘〉即指出：

文教之開興，吾閩最晚，至唐始有詩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詩人時有流寓入閩者，詩教乃昌；至宋而日益盛。¹⁴

陳衍把閩地詩人斷自唐代，並且以唐末五代為閩地「詩教」興盛的時間點。現存唐代閩籍詩人有百餘位，詩作約有三百多首，¹⁵本文擬回歸唐詩文本，佐以唐人墓

¹¹ 宋·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卷170，頁960。

¹²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7年），頁403-406。

¹³ 唐·劉知幾（661-721）《史通》內篇〈採撰第十五〉已指出：「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乎。」（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卷5，頁67。

¹⁴ 清·鄭杰輯，陳衍補訂：《閩詩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411。

¹⁵ 陳尚君：〈唐代閩籍詩人考〉，《唐代文學研究》第5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頁559-570。另參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

誌等文獻，期能對閩地如何藉由詩歌創作展現邊陲視野，進而回歸在地，在荒服中建構以詩為依歸的詩意家園。

二、唐代閩宦與閩人北宦的不同視域

唐前閩地，地處吳越與南越之間，或稱七閩、閩越，約當今福建、廣東東部潮梅一帶、浙江南部與江西東部的一部分。¹⁶在地理位置上，南越又稱南粵、嶺南、嶺外、嶺表、嶺海等，距離京城更為遙遠，發展反在閩地之上，秦已置南海郡，漢初趙佗建南越國，入唐更有張九齡成為開元四大名相之一，近人已編有《全粵詩》傳世。¹⁷相形之下，閩地僻處東南海濱，與浙江、江西交界處又有太姥山、武夷山與雁蕩山比肩聳峙，形成與中原地區阻絕的封閉性空間，因而長期保留有較多原住民的生活模式，同時也成為中原戰亂時士民的避禍之地，在唐更交會出極獨特的詩歌創作氛圍。

探討唐代宦閩，首先要辨明被閩臺地區奉為「開漳聖王」的陳元光（657-711），未見於兩《唐書》。張鷟（660?-741?）《朝野僉載》記載：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拽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¹⁸

外，榮新江：〈P.2672、S.6234+P.5007 唐人詩集的抄本形態與作者蠡測〉（四川大學：《第三屆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項楚教授七十華誕學術討論會論文集》，2009.7.28-29）一文，整理出唐末福建翁部在瓜沙為官留下大約有二三十首詩，據陳尚君表示真偽參半，尚待考辨，故暫未納入討論，有待他日增補。

¹⁶ 杜佑《通典》所載閩地包括：建安（建）六縣（建安、浦城、邵武、建陽、將樂、沙）；長樂（福）八縣（閩、侯官、福唐、長樂、連江、長溪、古田、尤溪、近置永泰）；清源（泉）四縣（晉江、南安、莆田、仙遊）；漳浦（漳）三縣（漳浦、龍溪、龍岩近置）；臨汀（汀）三縣（長汀、龍岩近為沙縣、寧化）；潮陽（潮）三縣（海陽、潮陽、程鄉）。唐·杜佑：《通典》，卷182〈州郡典·古揚州下〉，頁4850。

¹⁷ 陳永正主編、中山大學中國古文學研究所編纂：《全粵詩》（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8年），收錄詩作時間起自漢朝。

¹⁸ 唐·張鷟：《朝野僉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2，頁19。

稱陳元光為「嶺南首領」，明顯不屬於唐官體制，其細故殺人烹食的蠻性行徑，近於小說家的筆法。至元和七年（812）成書的林寶《元和姓纂》，陳元光已成了「右鷹揚將軍」。¹⁹至於《全唐文》卷164收其〈請建州縣表〉、〈請准謝表〉（又稱漳州刺史謝表），《全唐詩》收其〈落成會詠一首〉、〈示珣〉、〈太母魏氏半徑題石〉詩三首，又有許天正〈和陳元光平潮寇詩〉一首，《全唐詩補逸》收其〈漳州新城秋宴〉詩一首，童養年《全唐詩續補遺》收有另一首〈落成會詠〉詩。依詩文內容，閩地已是教化盛行，不類《開元志》與《朝野僉載》所載。檢視相關文獻，諸詩文大抵輯自後人修纂的漳州府志、漳浦縣志與陳氏族譜，不免如劉知幾所指摘「矜其州里，夸其氏族」，宜辨其偽。

唐代宦閩的政績，中唐以前主要表現在移風化俗與推行文教，先是開元十七年（729）有管元惠（664-738）的「誘彼閩越，俗成鄒魯」，後有大歷十年（775）李成公的「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數十年間看似政績斐然，對照之下則仍是原地踏步。天寶元年（742）蘇預〈唐故中大夫福州刺史管府君神道碑并序〉描述管元惠仕閩的政績如下：

（開元）十七年，除使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兼泉、建等六州經略軍使。仍迂天和，聿敷朝化，誘彼閩越，俗成鄒魯。……及領福也，風俗輕剽，封域險澀，置汀州以綏壓，作泉山府。……既執藩柄，又壯軍麾。仗義邊肅，寬和俗移。化本義及，教與和皆。海服孔淑，閩落允懷。²⁰

依此，管元惠仕閩期間，恩威並施，使閩越由「風俗輕剽，封域險澀」的未開化地區，發展成有如「鄒魯」般具有高度的文明教化。事實上，現存唐代閩人入仕之始，在開元十七年管元惠仕閩之前，薛令之（683-758）已於神龍年間登第。宋嘉定七年（1214）成書的李俊甫纂輯《莆陽比事》引昭宗大順二年（891）進士黃璞《閩川名士傳》云：

¹⁹ 唐·林寶：《元和姓纂》：「右鷹揚將軍陳元光……河東人。」（《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3〈諸郡陳氏〉，頁571。

²⁰ 吳剛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3集，頁11-12。

閩士鄉時雖能通文書、習吏業，不肯北宦，唐常袞為觀察使，乃擇鄉秀民勸以仕進，林端州公藻始擢貞元七年第，八年有歐陽詹。韓文公云閩人舉進士自歐陽詹始，史因之。及觀閩川名士傳，前有薛令之、林藻，以登科驗之，信然。豈韓文公偶未之詳。²¹

常袞（729-785）任福建觀察使在德宗建中元年（780），在任期間致力於改變閩士「不肯北宦」的現象，因而韓愈有「閩人舉進士自歐陽詹始」的錯覺。乃依黃璞《閩川名士傳》追溯閩人舉進士始於薛令之，其次為貞元七、八兩年的林藻與歐陽詹。李昉（925-996）等編纂《太平御覽》引黃璞《閩川名士傳》有如下記載：

薛令之，唐開元中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冷落，欠次難進。令之題詩云：「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縮，羹稀箸易寬。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因幸春宮，見之不悅，命筆之曰：「啄木背距長，鳳皇毛羽短。既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投簪謝爵，徒步東還。²²

仕至左補闕兼東宮侍講的薛令之，題詩在《全唐詩》中題為〈自悼〉，第一句作「朝日上團團」，餘同。²³詩中藉由日常飲食的苜蓿、澀飯與稀羹，映現冷官的處境。在唐人詩中，苜蓿與天馬、葡萄同為產自胡地的代表，而苜蓿又是馬食，如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的：「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全唐詩》，卷 126，頁 1271），因此，身為閩人的薛令之，以苜蓿為食，自是倍感辛酸。其後有戴叔倫〈口號〉詩云「最憐吟苜蓿，不及向桑榆。」（《全唐詩》，卷 274，頁 3099），唐彥謙〈聞應德茂先離棠溪〉詩云：「苜蓿窮詩味，芭蕉醉墨痕。」（《全唐詩》，卷 671，頁 7665），「苜蓿」儼然成為他鄉不遇的代名詞。惟同為李昉等編纂的

²¹ 宋·李俊甫纂輯：《莆陽比事》（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 1〈前代名賢皇朝進士〉，頁 14。

²² 宋·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卷 923，收入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頁 404-405。《全唐詩》收錄此二詩，前者題為〈續薛令之題壁〉（卷 3，頁 41），後者題為〈自悼〉（卷 215，頁 2247），字句略有出入。

²³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 215，頁 2247。為避繁瑣，本文所引唐詩凡出自本書者，採隨文加註卷頁。

《太平廣記》引《閩川名士傳》則作：「（中宗）神龍二年（706），閩長溪人薛令之登第。」²⁴據此，薛令之登第比林藻與歐陽詹早了八十幾年。

衡諸薛令之的冷官待遇，可知薛令之的京城經歷，並未能扭轉閩人「不肯北宦」的風氣。八十幾年後的林藻再度北上應試，仍非志在兼善或熱衷仕進，乃為扭轉閩地無文的負面描述，《莆陽比事》引《閩川名士傳》、《泉南錄》有如下記載：

林藻弟蘊，唐大歷中李成公錡為福建泉漳汀州觀察使，始至，興學校，獨孤及作新學碑，有曰：「比屋為儒，俊選如林」，而藻、蘊兄弟猶以「縵胡之纓，化為青衿」之語為憾。因銘硯泉石，刻志業文，未幾，藻舉進士，蘊擢明經，歐陽詹繼之，故當時有藻、蘊橫行，歐陽獨步之語。（同前，頁27）

李錡，別作李椅，核其行跡，應非憲宗時以叛被誅的李錡。所稱獨孤及（725-777），有〈送王判官赴福州序〉，對閩地仍持負面見解：

閩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嶺外峭峻，風俗剽悍。歲比饑饉，民方札瘥，非威非懷，莫可綏也。²⁵

仍以閩地風俗剽悍且多饑饉疫癘，不可安撫。至於新學碑，獨孤及有〈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并序〉，直稱「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李錡在閩三年而「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大歷十年（775）卒於任，銘文有「我閩我里，講論資始。比屋為儒，俊造于林。縵胡之纓，化為青衿」等語，²⁶繼天寶元年（742）蘇預稱管元惠「誘彼閩越，俗成鄒魯」之後，獨孤及為了誇大李

²⁴ 宋·李昉等編，王希斌點校：《太平廣記》（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494，頁59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閩中進士〉條云：「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15，頁1707。

²⁵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387〈獨孤及四〉，頁1741。

²⁶ 同前註，卷390〈獨孤及七〉，頁1754。

成公的教化，而把閩人鄙薄為「縵胡之纓」，²⁷是以林藻、林蘊與歐陽詹三人打破閩人「不肯北宦」的風氣，先是林蘊於貞元四年（788）明經及第，接著貞元七、八兩年又有林藻與歐陽詹先後登進士第，因而留下「藻、蘊橫行，歐陽獨步」的佳話。惟依歐陽詹〈送蔡沼孝廉及第後歸閩覲省序〉所言：「虛中以學，予謬以文，共受遣乎長吏，皆求試於宗伯。虛中登太常第，歸寧故園；予有曝鯉之困，猶留京師。」²⁸則歐陽詹待試京城時，閩人蔡沼已是明經及第，韓愈所云「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仍是輕明經而重進士之見。

歐陽詹（755?-800）留下比較多閩人業文應試與求仕的資料。李貽孫〈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指其年十許歲，「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父母有「此男子未知其指何知，要恐不為汨沒之饑氓也」之憂。歐陽詹〈與王式書〉詳述讀書求仕始末，書中形容兩人關係為「遊處最深」、「莆陽讀書，接席五年」，自述已冠時，「以為地分遐陋，進取必無遠大」而「懷耕食鑿飲之心」，本無意仕進，「予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群公則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予觀國之心」，因王式等人鼓勵而於貞元二年（786）辭親赴京，作〈泉州赴上都留別舍弟及故人〉詩有云：「天長地闊多岐路，身即飛蓬共水萍。」（《全唐詩》，卷 349，頁 3911）寫出閩人遠赴京城的天長水闊、身如飛蓬。而求仕更是多歧路，其〈上鄭相公書〉有云：

某代居閩越，自閩至於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於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逾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回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²⁹

閩地的「遐陋」，做為入京求仕的先行者，歐陽詹細數一路上由絕同鄉、絕同方到無親無舊、孤根無依，就此展開了長達六年的待試京城歲月，〈與王式書〉即直言：

受遣之明年，達於長安。賃廡六秋，禮闈四上，頻竭激昂之力，累為簸揚之棄。反躬忖己，徘徊又疑，豈常、薛公輕於布素，而有佞歟？為群公溫良，與朋友有不忠歟？楊朱對歧，墨翟觀素；勁挺之志，半作歸心。³⁰

²⁷ 「縵胡之纓」語出《莊子·說劍》，指「無所用於國事」的蓬頭突鬢庶人。

²⁸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596〈歐陽詹二〉，頁 2671。

²⁹ 同前註，頁 2669。

³⁰ 同前註，頁 2668。

歷經四次的禮部考試，幾乎磨掉了所有的壯志、熱情與信心，不但質疑自己，甚至懷疑起朋友的謬賞，而萌生歸心，更欲「審核良驚，摭分進退」、「如其不可，則任材任器，息干時之機，謝風塵之苦」，最後甚至提出「人生於世，區區者所務，豈不立名乎？有名于國，亦名也；有名於家，亦名也。予何攘臂於其間，醜於家而美于國哉？」由閩入京，一再受挫場屋的歐陽詹，實在無法體會「醜於家而美于國」的意義。

貞元八年（792），歐陽詹與賈稜、韓愈、李觀、崔群等二十二人同登進士，時稱「龍虎榜」，其〈及第後酬故園親故〉詩有「才非天授學非師」、「猶著褐衣何足羨」（《全唐詩》，卷 349，頁 3907），性既孤傲，仕途依然偃蹇，韓愈有〈駑驥吟示歐陽詹，詹與愈同第進士，愈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詹時為國子監四門助教〉詩，藉由「騏驎生絕域，自矜無匹儔」，卻困於「人皆劣騏驎，共以駑駘優」，因而有「才命不同謀」（《全唐詩》，卷 337，頁 3782）之歎。歐陽詹除了在〈答韓十八駑驥吟〉詩中以「室在周孔堂，道通堯舜門。調雅聲寡同，途遐勢難翻。」（《全唐詩》，卷 349，頁 3900）作回應，同傷才大難用的委曲迤邐，更在〈上鄭相公書〉中自白「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的困窘，並詳細剖析朝廷在考選與用人制度的不合宜：

四門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希。某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睹高衢遠途矣。況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同前）

唐朝的科舉取士已施行一百多年，士子早已熟諳且遵循朝廷考選與用人的程序，來自遐陋閩地、自始即無意仕進的歐陽詹，視家與國為生命中同等重要的場域，待試京城六年之後，僅得四門助教，³¹因而細數升遷管道，從四門助教到太學助教

³¹ 四門助教為學官，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指出「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檟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本多為博雅莊敬者，貞元中漸不受重視，以致「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因此，柳立、武儒衡與歐陽詹三位文士在同一年擔任四門助教，「京師以為異」。見清·董皓編：《全唐文》，卷 580〈柳宗元十二〉，頁 2594。

再到國子助教，大約要費去三十年的時間，而且還脫離不了「助教」乙職，很難獲得力爭進取的成就感。忍著對慈親的思念纏綿與徹骨牽掛，歷經禮部五試、吏部四試的委曲迍邐，還要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四考五選中耗盡生命，如此「一生不睹高衢遠途」的沮喪與焦慮，畢竟以卒於四門助教，年四十餘。韓愈為作〈歐陽生哀辭〉，推闡歐陽詹無意出仕的初衷：「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史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有云：

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³²

雖善為維護，對歐陽詹而言，無論是閩越的家或京城的家，畢竟是兩頭落空，都難謂無憾。甚至在感情方面，曾薄游太原，與樂籍女子相悅，臨別贈詩略云：「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瓠，早晚期相親。」³³此事歷代多有辨其偽者，純就詩意來看，雖清楚意識到彼此存在著極大的反差，卻仍期待相親，終究是悲劇一場，亦可見其心事之一斑。

歐陽詹之後，貞元十年（794）又有陳通方進士及第。惟閩人在京畢竟是無親無舊、孤根無依，自然形成甌閩鄉親的相濡相慰，如歐陽詹〈玩月〉序所云：「貞元十二年，甌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萇、濟南林蘊、潁川陳詔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夜，詣陳之居，修厥玩事。」（《全唐詩》，卷 349，頁 3899）其中陳詔於貞元十三年（797）及第，邵楚萇於貞元十五年（799）及第，許稷於貞元十七年（801）及第，因此才有前引貞元十七年杜佑《通典》所稱永嘉文風傳播閩越的說法。開成三年（838）更出現「閩中四人登科」的盛況，而有「幾人天上爭仙桂，一歲江南折四枝」的佳話。³⁴依劉海峰「唐代福建進士科名表」，共考出有明確可信史料根據的唐代福建進士 56 人，³⁵其中

³² 清·董誥編：《全唐文》，卷 567〈韓愈二十一〉，頁 2542。

³³ 宋·李昉：《太平廣記》〈情感〉引《閩川名士傳》，卷 274。《全唐詩》，卷 349，頁 3903。

³⁴ 清·徐松：《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卷 21 錄《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頁 777。

³⁵ 劉海峰：〈唐代福建進士考辨〉，《集美大學教育學報》第 2 卷第 1 期（2001 年 3 月），頁

49 人即出現在貞元之後的百年間，歐陽詹等人對扭轉閩人「不肯北宦」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三、唐詩中關涉閩地去來的多重記憶

政治建置以京城為「中國」的思維，使四方有志之士以京城為實踐理想的共同場域，以致《韓詩外傳》引《詩》有「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吳越春秋》有「胡馬依北風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而漢佚名〈古詩十九首〉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入唐後猶有一行的「山河兩戒」之說：

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坦，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³⁶

相對於「限戎狄」的北戒，東甌、閩中即屬於「限蠻夷」的南戒。不論是仕宦或戰爭，中原士民的入閩／仕閩，或閩人的上京應試與游宦，跨越兩戒之後的足跡所履，必然在交錯間激蕩出更多重的記憶。

（一）閩人北宦與避胡入閩的不同記憶

永嘉之亂導致晉室南遷的歷史記憶，隨著蕃將安史之亂的暴發，成了唐代詩人吟詠所寄，如李白（701-762?）〈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之二的「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全唐詩》，卷 167，頁 1725）、張籍（767?-830?）〈永嘉行〉的「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全唐詩》，卷 382，頁 4282），形塑出「避胡南渡」的獨特主題。耐人尋味的是，唐詩中雖有不少關涉永嘉避胡南渡

20-24。

³⁶ 宋·宋祁、歐陽脩等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卷 31〈天文志一〉，頁 817。

的吟詠，大抵集中在南朝京城建業、謝安故居永嘉等地。直到貞元四年（788）明經及第的林蘊，在〈睦州刺史二夫君神道碑〉自述家世，才以比較寬泛的地理概念，使永嘉南渡與閩地有了連結，云：

暨永嘉初，清河祿公牧于溫嶺，至府君，十六代五百餘年，綿綿蟬聯，不歸不遷，氣吞豪家，族茂閩川。³⁷

溫嶺在地理沿革上，歷經東甌、閩中郡、會稽郡、臨海郡、永嘉郡等變遷，屬於具游移性的過渡空間感覺，相形之下，綿延五百多年而「不歸不遷」的閩川，顯然已成了新的家鄉，更在北宦閩士的不斷記憶中，浮現出獨特的閩地風景。以現存詩文較多的歐陽詹為例，在離開閩地後的遊宦，連續有三首詩題以「亦閩人也」作為連結，表達到故鄉的繫念，云：

正是閩中越鳥聲，幾回留聽暗沾纓。傷心激念君深淺，共有離鄉萬里情。
（〈與林蘊同之蜀途次嘉陵江認得越鳥呈林林亦閩中人也〉，《全唐詩》，卷 349，頁 3911）

村步如延壽，川原似福平。無人相共識，獨自故鄉情。（延壽，蘊之別墅。福平，余之別墅。）（〈蜀門與林蘊分路後屢有山川似閩中因寄林蘊蘊亦閩人也〉，《全唐詩》，卷 349，頁 3909）

青苞朱實忽離離，摘得盈筐淚更垂。上德同之豈無意，故園山路一枝枝。
（〈與洪孺卿自梁州迴途中經駱谷見野果有閩中懸壺子即同採摘因呈之洪亦閩人〉，《全唐詩》，卷 349，頁 3910）

不同的路途，只要同為閩中人，即可藉由不斷尋覓「閩中越鳥聲」、「山川似閩中」、「閩中懸壺子」的風景或野果，作為記憶家園與故鄉情的共同載體。事實上，走出閩地，藉由足跡經行，更清楚浮現的是「山河兩戒」所衍生的南北限隔。由閩北宦又入蜀的歐陽詹，詩云：

³⁷ 陳尚君輯：《全唐文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 62，頁 575。

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煙景兩邊意，蜀客秦人各斷腸。
(〈題秦嶺〉，《全唐詩》，卷 349，頁 3910)

南北風煙即異方，連峰危棧倚蒼蒼。哀猿咽水偏高處，誰不沾衣望故鄉。
(〈題梨嶺〉，《全唐詩》，卷 349，頁 3912)

對蜀人而言，秦嶺把帝鄉與南方區隔成兩個不同的世界，歐陽詹認為這種切割，同時傷害了蜀客與秦人的感情。連峰危棧的梨嶺，同樣限隔了閩地與中原，使「家」與「國」成了相對立的「異方」，回應著歐陽詹〈與王式書〉有「何攘臂於其間」的不解與遺憾。即使是元和十二年（817）進士及第的周匡物，徒步應舉而受阻錢塘江時，依然有「萬里茫茫天塹遙」的感歎。³⁸

至於避「胡」南渡而入「蛇種」所居的閩地，依顧況（727?-815?）所作〈永嘉〉詩，顯然仍保留比較多的原住民色彩，詩云：

東甌傳舊俗，風日江邊好。何處樂神聲，夷歌出煙島。（《全唐詩》，卷 267，頁 2959）

東甌約當永嘉地區，甌與閩均屬當地原住民，越王勾踐六世孫為楚所滅後進入當地，而有甌越與閩越之稱。顧況重視「聲教」，³⁹詩中除了指出「舊俗」的根深蒂固，「樂神聲」與「夷歌」顯然都屬於當地特有風謠，完全看不出杜佑《通典》所稱「顏、謝、徐、庾之風扇焉」。此外，顧況〈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罔一章〉詩，有〈序〉云：「罔，哀閩也。罔音蹇，閩俗呼子為罔，父為郎罷。」保留了閩地特有的親屬稱謂，更對閩人處境有深刻剖析，其詩云：

罔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罔：吾悔生汝。

³⁸ 宋·李昉等編，王希斌點校：《太平廣記》，卷 199〈文章二〉引《閩川名士傳》，頁 712。

³⁹ 顧況〈悲歌〉序有云：「情思發動，聖賢所不免也，故師乙陳其宜，延陵審其音，理亂之所經，王化之所興，信無逃於聲教，豈徒文彩之麗耶，遂作歌以悲之。」（《全唐詩》，卷 265，頁 2942）

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因別郎罷，心催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全唐詩》，卷 264，頁 2930）

唐代行政與律法可謂嚴密，即使到了唐朝中葉，詩中所映現的閩吏行徑，對人子施以絕陽、髡鉗等不人道的酷刑，更視為奴隸而獲取暴利，百姓卻只能發出「天道無知」、「神道無知」的原始而無助呼告，父子泣血訣別的悲慟慘怛，彷彿閩地猶為化外之地，朝廷派遣的地方官扮演的是掠奪者的角色，完全看不出行政作為與教化成效。

相形之下，永嘉之亂士民南渡入閩的記憶，顯然是因著唐末五代京城陷入爭戰，迫使中原士民選擇避亂入閩的想像。詩中明確提到入閩則屬五代詹琲（950?-?）的〈永嘉亂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憶昔吟〉，詩云：

憶昔永嘉際，中原板蕩年。衣冠墜塗炭，輿輅染腥膻。國勢多危厄，宗人苦播遷。南來頻灑淚，渴驥每思泉。（《全唐詩》，卷 761，頁 8643）

詹琲藉由記憶永嘉的中原板蕩、衣冠播遷入閩，宣洩悲憤之情。而唐末中原衣冠的大量入閩，則是促成閩詩興盛的關鍵。影響所及，宋初路振（957-1014）《九國志》所稱：「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林、陳、黃、鄭、詹、邱、何、胡是也。」以及淳熙九年（1182）成書的梁克家《三山志》所記為：

爰自永嘉之末，南渡者率入閩，陳、鄭、林、黃、詹、丘、何、胡，昔實先之。閱五朝，隋、唐戶口既蕃，衣冠始集。⁴⁰

前引《開元錄》以林、黃兩姓為「蛇種」之說，已一變而為西晉末中原入閩的八族之二，更與前述閩人記憶有很大的落差。

（二）閩人北宦與仕閩者交互映現的閩地書寫

相較於閩人北宦的不斷記憶故鄉風景，唐人的「仕閩」書寫，初唐尚不多見，

⁴⁰ 宋·梁克家：《三山志》（《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卷 26〈人物類一〉，頁 2。

衡諸狄仁傑（630-700）在神功元年（697）的上疏，仍有「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的主張，⁴¹把五嶺以南的閩中劃歸在「封疆之外」。因此，即使令薛令之（683-758）已於神龍年間登第，李頎（690-751）〈送人尉閩中〉也只有「海戍通閩邑，江航過楚城」（《全唐詩》，卷 134，頁 1360）二句的泛言閩地的僻遠。

大抵而言，跨安史之亂（755-763）的一代，對閩中仍抱持著「異方」的觀點，如皇甫曾〈送韋判官赴閩中〉的「路人從北少，海水向南分」（《全唐詩》，卷 210，頁 2183），高適（700-765）〈送鄭侍御謫閩中〉的「大都秋雁少」、「南天瘴癘和」（《全唐詩》，卷 214，頁 2230）等，即充滿對「異方」的疏離感。又如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所云：

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漢臣。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連年不見雪，到處即行春。（《全唐詩》，卷 208，頁 2170）

藉由海洋與雲山的阻絕交通，凸顯出閩地的荒服屬性，主要著眼點仍在來朝入貢的不對等關係，同時也注意到常年溫暖如春的特殊物候。尤以劉長卿（726?-786?）送人入閩詩多達六首，其〈送崔載華張起之閩中〉云：

不識閩中路，遙知別後心。猿聲入嶺切，鳥道問人深。旅食過夷落，方言會越音。西征開幕府，早晚用陳琳。（《全唐詩》，卷 147，頁 1489）

首句即是「不識閩中路」，與其〈送秦侍御外甥張篆之福州謁鮑大夫秦侍御與大夫有舊〉首句「萬里閩中去渺然」（《全唐詩》，卷 150，頁 1558），以及〈送喬判官赴福州〉的「王程鳥路通」，都顯現出對閩地的全然陌生感。因此，劉長卿筆下的「閩中」，充滿「異方」的色彩，甚至借用左思〈三都賦〉所稱：「巖岡潭淵，限蠻隔夷。蠻陬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⁴²指涉閩地「蠻陬夷落」的邊陲屬性，包括居住、飲食與語言等迥異於中原的生活方式，都是崔載華、張

⁴¹ 五代·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卷 89〈狄仁傑列傳〉，頁 2889。

⁴²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全晉文》卷 74 左思〈魏都賦〉，頁 1887。

起兩人所要面對的挑戰。結語更以曹操起用袁紹舊部陳琳的典故，把「西征開幕府」當作兩人進階之途，在當時人眼中，西北絕域顯然還在東南窮海之上。劉長卿在〈送喬判官赴福州〉詩中，除了繼續使用「夷落」一辭，甚至以一句「應憐百越空」（《全唐詩》，卷 148，頁 1508），想像喬判官的任滿離職，閩地即空無人文，不論其意旨是官員的無所作為或當地的不可教化，都把閩地劃歸化外。至於皇甫冉（717?-770）〈酬李判官度梨嶺見寄〉所云：

隴首怨西征，嶺南雁北顧。行人與流水，共向閩中去。（《全唐詩》，卷 250，頁 2831）

把隴首與嶺南並列為兩大畏途，而閩中行更是有如流水的去無還期，已非畏途所得形容。

閩中書寫的改觀，貞元四年（788）開始的林藻、林蘊與歐陽詹先後及第，有著關鍵性的影響。皎然（720?-804?）〈送沈秀才之閩中〉詩云：

越客不成歌，春風起淥波。嶺重寒不到，海近瘴偏多。野戍桃榔發，人家翡翠過。翻疑此中好，君問定如何。（《全唐詩》，卷 818，頁 9217）

皎然詩中所映現的閩地，還保留若干懸疑處，隔嶺濱海的濕熱氣候，桃榔與翡翠等特有物產，在陌生之餘，皎然提出「翻疑此中好」的正向見解，已是突破。比歐陽詹晚一年登進士第的劉禹錫（772-842），有〈送唐舍人出鎮閩中〉云：

暫辭鴛鴦出蓬瀛，忽擁貔貅鎮粵城。閩嶺夏雲迎皂蓋，建溪秋樹映紅旌。山川遠地由來好，富貴當年別有情。了卻人間婚嫁事，復歸朝右作公卿。（《全唐詩》，卷 359，頁 4047）

對於閩地的描述，已能肯定閩嶺夏雲、建溪秋樹為「山川遠地由來好」，由「出鎮閩中」到「復歸朝右」，閩中的地方歷練彷彿成了「作公卿」宦途捷徑。

更多的北宦閩人，藉由記憶故鄉與京城交遊，也使得閩中書寫有更豐富的方向。寶曆元年（825）舉進士的歐陽袞，約於文宗開成前後在世，項斯有〈送歐陽袞歸閩中〉詩云：

秦城幾年住，猶著故鄉衣。失意時相識，成名後獨歸。海秋蠻樹黑，嶺夜瘴禽飛。為學心難滿，知君更掩扉。（《全唐詩》，卷 554，頁 6407）

入京後始終堅持「故鄉衣」，成名後又選擇獨自返鄉，歐陽袞的獨特裝扮與志尚，在追逐名利與時尚的熙熙攘攘京城中，更加顯得獨樹一幟。即令項斯對陌生的閩地仍只有「海秋蠻樹黑，嶺夜瘴禽飛」的認知，對於成名返鄉、一心掩扉向學的歐陽袞，仍許以為學知不足而有著很深的敬意。寶曆二年（826）舉進士的朱慶餘，有〈送羅先輩書記歸後卻還閩中留別〉詩云：

同是越人從小別，忽歸鄉里見皆驚。湖邊訪舊知誰在，暮下留歡但覺榮。
望嶺又生紅槿思，登車豈倦白雲程。況當季父乘恩日，廉問南州政已成。
（《全唐詩》，卷 515，頁 5883）

朱慶餘，《唐才子傳》以為閩中人，⁴³此詩題有羅先輩還閩中等語，首句又稱「同是越人」，或是地域寬狹的解釋問題。不論是「忽歸鄉里」的驚訝，或訪舊留歡的引以為榮，閩地人才成功地扮演著邊陲與京城的連結，使紅槿與白雲相互輝映，更促使「南州」獲得重視與發展。閩人的成名返鄉，幾為風氣，鄭谷（851?-910）〈送京參翁先輩歸閩中〉也寫道：

解印東歸去，人情此際多。名高五七字，道勝兩重科。宿館明寒燒，吟船兀夜波。家山春更好，越鳥在庭柯。（《全唐詩》，卷 674，頁 7709）

帶著京城的盛名與人脈，回到家鄉，享受春山美景，過著陶潛〈停雲〉詩的「翩翩飛鳥，息我庭柯」的詩意生活，⁴⁴對於閩地風氣的形塑，有著關鍵性的作用。

因此，閩人對於仕閩者自然有著更多的期許，積極提出更多的作為空間，林寬（873?）在〈送人宰浦城〉詩中即直言：

⁴³ 元·辛文房撰，周紹良箋證：《唐才子傳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 6，頁 1547。

⁴⁴ 晉·陶潛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 11-12。

東南猶阻寇，梨嶺更誰登。作宰應無俸，歸船必有僧。灘平眠獺石，燒斷飲猿藤。歲盡校殊最，方當見異能。（《全唐詩》，卷 606，頁 7000）

閩地的天然險阻與人爲叛亂，向來被視爲畏途，往來者主要是缺乏實權的地方官員與出世僧侶，處處是亟待開闢的獺石猿藤，在缺乏經費、人才的情況下，若能在歲末考校治績時有傑出的表現，正是衡量「異能」的最好指標。林寬又在〈送李員外頻之建州〉指出：

句踐江頭月，客星臺畔松。為郎久不見，出守暫相逢。鳥泊牽灘索，花空押號鐘。遠人思化切，休上武夷峰。（《全唐詩》，卷 606，頁 6999）

林寬雖把閩地歷史追溯到越王句踐，卻也很清楚閩地始終留不住人才的困境，導致宦閩者的來來去去，終究無助於閩地的開發，因而結尾以「遠人思化切」寄予厚望，並以「休上武夷峰」的祈求語作結，一旦跨出閩境西北的武夷山，還有誰會在乎閩地呢？李頻（?-876）爲大中八年（854）進士，有〈之任建安淶溪亭偶作二首〉云：

入境當春務，農蠶事正殷。逢溪難飲馬，度嶺更勞人。想取烝黎泰，無過賦斂均。不知成政後，誰是得為鄰。

維舟綠溪岸，繞郡白雲峰。將幕連山起，人家向水重。短才無獨見，長策未相逢。所幸分堯理，烝民悉可封。（《全唐詩》，卷 589，頁 6839）

也許受到林寬詩的感召，李頻首先觀察到閩地的封閉性：溪急難飲馬，嶺峻難度越，而群山環繞的郡城，形成與外界隔絕的空間，卻又有著豐沛的農業灌溉水資源，面對如此獨特而陌生的地理環境，李頻有「短才無獨見，長策未相逢」的困惱，也說明前人並未留下有效的「治閩」策略，因而提出「賦斂均」的利民措施，並且減少帝力的干預，庶幾可達堯時百姓無事，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樂境。⁴⁵曹松（828?-903）

⁴⁵ 詳見廖美玉〈中古詩人如何走向「獨善」之路〉闡釋其義，收入《回車：中古詩人的生

入閩依李頻之前，有〈林下書懷寄建州李頻員外〉詩云：

一從諸事懶，海上跡宜沉。吾道不當路，鄙人甘入林。雲垂方覓鶴，月溼始收琴。水石南州好，誰陪刻骨吟。（《全唐詩》，卷 716，頁 8228）

對懷才不遇的曹松而言，閩地自然是「水石南州好」，因而選擇入閩陪李頻共為「刻骨吟」。而李頻在閩也確能實踐「烝黎泰」的治績，於乾符三年（876）病死於任內。⁴⁶此外，羅隱（833-909）也在〈送沈光侍御赴職閩中〉指出：

未至應居右，全家出帝鄉。禮優逢苑雪，官重帶臺霜。夜浦吳潮吼，春灘建水狂。延平有風雨，從此是騰驤。（《全唐詩》，卷 659，頁 7568）

沈光於咸通七年（866）舉進士第，以侍御史入閩，可見閩地已不再是卑官謫宦淪落的「異方」，而是朝廷禮遇要員得以攜家帶眷赴任的地方。另一方面，閩地獨特的狂潮風雨等濱海地景物候與民情，也因朝廷要員的參與而大幅躍進。全詩縮結朝廷要員與閩地險阻，彼此相激相成，共同騰驤，落實閩地經歷在宦途得意上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林寬詩中所謂「歸船必有僧」，指出佛教在閩地的發展與普及性，僧侶的閩地書寫可與宦閩者相互輝映。如皎然（720?-804?）〈答道素上人別〉有「春色遍遠道，寂寞閩中行」（《全唐詩》，卷 818，頁 9214）、裴休（791-846）〈贈黃蘗山僧希運〉有「挂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全唐詩》，卷 563，頁 6530）等語，大歷貞元間（766-804）法振〈送人遊閩越〉詩云：

不須行借問，為爾話閩中。海島陰晴日，江帆來去風。道游玄度宅，身寄朗陵公。此別何傷遠，如今關塞通。（《全唐詩》，卷 811，頁 9142）

僧人遊方，本無遠近，行跡所履所住，對於邊陲的記憶與書寫，宜是另一個值得

命印記》（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頁 47-101。

⁴⁶ 曹松有〈哭李頻員外（時在建州）〉詩云：「出麾臨建水，下世在公堂。苦集休開篋，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莫，嶺外一妻孀。定是浮香骨，東歸就故鄉。」（《全唐詩》，卷 716，頁 8228）

關注的議題。

四、邊陲視域中的黎元、家園與詩歌

就文獻記載而言，東南早入中國版圖，惟唐人對東南窮海的畏惡之感，宋之間（656?-712?）〈發藤州〉有云「魍魅天邊國，窮愁海上城」（《全唐詩》，卷 53，頁 652），元結（723-772）〈送孟校書往南海〉猶云：「吾聞近南海，乃是魍魅鄉」（《全唐詩》，卷 241，頁 2710），張登〈送王主簿遊南海〉云：「明日東南路，窮荒霧露天」（《全唐詩》，卷 313，頁 3525），乃至晚唐杜牧在〈見宋拾遺題名處感而成詩〉中仍是「竄逐窮荒與死期，餓唯蒿藿病無醫」（《全唐詩》，卷 521，頁 5961），彷彿終唐之世，東南始終未脫窮荒之名。就閩地而言，藉由避亂與仕宦的交通，已有較多的對話與書寫，再進一步觀察百餘位閩籍詩人作品，⁴⁷實可開啓更多元的邊陲視域。

（一）在邊陲戰爭中浮現的黎元

中國自古有所謂九州、五服，閩地屬於「蠻夷要服」，比起戎狄的「荒服」，⁴⁸看似略勝一籌，實則更在化外，漢賈捐之引《詩》：「蠢爾蠻荆，大邦為讎。」以為「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已有棄珠崖之議。⁴⁹因而同為遐荒之地、邊徼之鄉，福建的僻處東南瘴嶺窮海，比起西北的邊沙絕域，是相對比較少戰爭的地方。因此，閩人北宦或遊邊時，一則具有同為邊陲的處境，再則是西北與東南的遙遠距離，所觀看與書寫的邊陲治理與戰爭，必然有不同的視角與見解。

閩地屬於亞熱帶海洋型季風氣候，溫暖多雨，四季如春，天寶中曾任汀州刺史樊晃，〈南中感懷〉詩中即指出：「四時不變江頭草，十月先開嶺上梅。」（《全唐詩》，卷 114，頁 1166）終年常青的草木，冬季綻放的梅花，與西北塞

⁴⁷ 陳尚君：〈唐代閩籍詩人考〉，《唐代文學研究》第 5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10 月），頁 559-570。另參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0 年）；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⁴⁸ 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云：「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卷 4，頁 136）

⁴⁹ 漢·班固：《漢書》，卷 64 下〈賈捐之傳〉，頁 2834。

外形成極大的對比。元和十四年（819）舉進士的閩人陳去疾，有〈塞下曲〉詩云：

春至金河雪似花，蕭條玉塞但胡沙。曉來重上關城望，惟見驚塵不見家。
（《全唐詩》，卷 490，頁 5553）

完全不同於閩地物候，即使是春臨大地，放眼所見仍只是雪花與沙塵，旅人習慣藉由登高望遠、遠望當歸的思鄉模式，完全被摒擋在胡沙與雪花的迷漫中，因此，陳去疾乃在〈偶題〉中吟咏著：

魂夢天南垂，宿昔萬里道。池台花氣深，到處生春草。（《全唐詩》，卷 490，頁 5554）

藉著夢回天南，讓視覺與嗅覺浸沐在故園春色中。在閩籍詩人筆下，西北絕域迥非東南窮海可得而比，如林寬〈塞上還答友人〉云：

無端遊絕塞，歸鬢已蒼然。戎羯圍中過，風沙馬上眠。草衰頻過燒，耳冷不聞蟬。從此甘貧坐，休言更到邊。（《全唐詩》，卷 606，頁 7002）

風沙、衰草等絕塞景觀，以及組合性住屋、不斷遷移等異族生活模式，又少了「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等四候的變化，⁵⁰使詩人失去了心靈的感動，因而寧可貧困也不願出塞。黃滔在〈逢友人〉詩中深切表達出「瘴嶺行衝夏，邊沙住隔冬」（《全唐詩》，卷 704，頁 8105）的體會，濕熱與酷寒都不是理想的居住環境，依〈送友人遊邊〉所云：

虜酒不能濃，縱傾愁亦重。關河初落日，霜雪下窮冬。野燒枯蓬旋，沙風匹馬衝。薊門雖漢土，千里斷人蹤。（《全唐詩》，卷 704，頁 8101）

舉杯未必能澆愁，更何況異族所釀的酒，高適〈營州歌〉已有「虜酒千鐘不醉人」

⁵⁰ 梁·鍾嶸撰，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序》（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1992年），頁 76。

（《全唐詩》，卷 214，頁 2242）的體驗。最難以適應者當屬冬季日照短，兼且霜雪連天，伴隨著枯蓬與沙風，實在不宜居住，因而對著如此「漢土」，卻有著很深的疏離感。即使是短暫的花開季節，黃滔在〈河梁〉詩中直言「隴花開不艷，羌笛靜猶悲」（《全唐詩》，卷 704，頁 8105），也很難激發出認同感。此外，心繫東南故鄉卻身處西北絕域所造成的身心悖離，如曹松〈邊上送友人歸寧〉詩云：

鄉路穿京過，寧心去少同。日斜尋閭磧，春盡逐歸鴻。獨樹河聲外，凝笳塞色中。憐君到此處，卻背老萊風。（《全唐詩》，卷 716，頁 8233）

欲求北宦卻到了遠離京城的另一個邊陲，困守在一望無際的砂磧中，所見所聞盡是塞外景色，於是把生命意義再度拉回家園親情。曹松由此更進一步解構建立邊功的謬思，〈塞上行〉云：

上將擁黃鬚，安西逐指呼。離鄉俱少壯，到磧減肌膚。風雪夜防塞，腥羶朝繫胡。為君樂戰死，誰喜作征夫。（《全唐詩》，卷 716，頁 8225）

用了一生中最精華的歲月，在砂磧、風雪等惡劣環境中，展開一場又一場的征戰與戍守，結果不論是為君王而戰死或老去，或者擁戰功而貴為上將，戰場殺戮與爭地奪城的暴力血腥，都與人的本性不合。曹松更由此而開拓出「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黎元視角，〈己亥歲二首（僖宗廣明元年）〉詩云：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漁。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傳聞一戰百神愁，兩岸疆兵過未休。誰道滄江總無事，近來長共血爭流。
（《全唐詩》，卷 717，頁 8238）

第一首由戰火漫延到天南的澤國江山，感慨人民生存權的日益失落，而探究根源，竟只是少數人為著一圓馬上封侯的功名夢，貪圖邊功，以致於剝奪了數以萬計的無辜百姓生命，一句「一將功成萬骨枯」道出了天下生民的蒼白控訴。第二首更以每一次的戰爭都是互有輸贏，也就形成兵連禍結、永無寧日的傷害。杜甫〈兵

車行)的「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全唐詩》，卷 216，頁 2255)，係就西北邊陲的戰役而言，相形少戰事的澤國滄江，也在晚唐捲入戰火，亙古江水與陣亡人血匯流的慘烈畫面，激起閩詩人對邊陲戰爭的更多省思，在澤國的地表上撿拾更多的歷史殘片，如陳陶〈南海石門戍懷古〉云：

漢家征百越，落地喪貔貅。大野朱旗沒，長江赤血流。鬼神尋覆族，宮廟變荒丘。唯有朝臺月，千年照戍樓。(《全唐詩》，卷 745，頁 8477)

陳陶以記憶漢朝南征百越的慘烈戰事，勇猛戰士的鮮血染紅了長江水，也無法改變毀滅性的結局，所有曾經在這一塊土地上努力過的族人與建設，就此消失在歷史的舞臺上。生長邊陲的詩人，凝視著這一場戰爭的殘蹟，思考著更多具征服性的邊陲戰爭，把目光轉向更遙遠的西北絕域，寫下〈胡無人行〉：

十萬羽林兒，臨洮破郅支。殺添胡地骨，降足漢營旗。塞闊牛羊散，兵休帳幕移。空流隴頭水，嗚咽向人悲。(《全唐詩》，卷 745，頁 8465)

〈胡無人行〉源於南朝，吳均寫的是漢人與外族之間永無止境的戰爭：「鐵騎追驍虜，金羈討黠羌」，結語「男兒不惜死，破膽與君嘗」，道出男人無可迴避的宿命。⁵¹入唐而有李白的「履胡之腸涉胡血」、「胡無人，漢道昌」(《全唐詩》，卷 745，頁 8465)，聶夷中的「自然胡無人，雖有無戰爭」(《全唐詩》，卷 745，頁 8465)，都以滅族的血腥暴力，使漢族成爲獨霸天下的至尊。帶有東南邊陲視角的陳陶，對於不斷堆積的胡地骨，顯然懷抱著更多的不解與哀傷。陳陶〈塞下曲〉其二更指出：

望湖關下戰，雜虜喪全師。鳥啄豺狼將，沙埋日月旗。牛羊奔赤狄，部落散燕耆。都護凌晨出，銘功瘞死屍。(《全唐詩》，卷 745，頁 8465)

戰場上的毀滅性殺戮過後，遍野的死屍，奔竄的牛羊，殘破的家園，一句「銘功瘞死屍」，寫出邊陲戰爭的荒謬本質。至其〈隴西行四首〉，其一寫出「縱饒奪得

⁵¹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卷 40，頁 597。

林胡塞，磧地桑麻種不生」，是邊陲戰爭的另一種荒謬本質。其二云：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全唐詩》，卷 746，頁 8492）

這是另一首膾炙人口的邊塞詩，陳陶以漢賈捐之論「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弊為藍本，取其議罷珠崖所云：「父戰死於前，子鬥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⁵²每一個奮不顧身而命喪沙場的男子，背後都有其至愛家人的殷切繫念。因此，陳陶以同理心將東南窮海故事複製到西北絕域，把無辜戰骨與深閨春夢並置而成的圖像，鐫刻成最深邃的歷史印記。陳陶在最後結尾寫出「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以跨國婚姻的種族融合，抹去殺戮戰場上殘留的傷痕。不論華夷，生存權都是最基本的人權，特別邊陲戰爭的中戍卒，大抵係以庶民去從事戰士的事情，衡諸唐太宗李世民在《晉書·帝紀第一》所宣示的「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⁵³杜甫的呼應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全唐詩》，卷 216，頁 2266）、〈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的「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全唐詩》，卷 232，頁 2556），戰場殺戮實為廣大黎元所難以理解而又無解者。閩人藉由邊陲戰爭凸顯黎元心聲，以此來看曹松的〈觀華夷圖〉，詩云：

落筆勝縮地，展圖當晏寧。中華屬貴分，遠裔占何星。分寸辨諸岳，斗升觀四溟。長疑未到處，一一似曾經。（《全唐詩》，卷 716，頁 8225）

此一華夷圖具有世界地圖的概念，大唐端居遼闊的中原精華區，邊陲地區各有不同民族居住，天然的山巒江海形成此疆彼界的限隔。世界之大，必然有許多政治統轄權所到不了的地方，經由地圖而呈現出更具全面性的觀察，曹松乃提出「展圖當晏寧」的觀念，期待遵循天然疆界的劃分，建立一個華／夷各安其居的和平世界。

⁵² 漢·班固：《漢書》，卷 64 下〈賈捐之傳〉，頁 2833。

⁵³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頁 20。

(二) 在荒服中營建的家園風景

由於天然山海的屏障，閩地自古與中原少交通，即使到了中唐，林藻、林蘊與歐陽詹三人已先後北宦，時人對閩地的形容仍有很大差異。哀祭文是探討閩的重要文獻之一，惟在撰述上常為凸顯不同成就，而時有偏頗或矛盾現象，試比較下列二段文字：

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史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⁵⁴

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⁵⁵

前者出自韓愈〈歐陽生哀辭〉，後者出自劉禹錫〈薛公神道碑〉。韓愈與歐陽詹為同榜進士，次年劉禹錫舉進士，寫作背景與時間相近，而二文所映現的閩地，雖同有土地肥衍與負海之饒等天然資源的優勢，在人文發展上卻有秀民／悍民、通文書史事與上國齒／與華語言不通、山泉禽魚之樂／居洞砦家桴筏等落差，彷彿兩個不同的世界。因此，以閩詩為文本的考察，看詩人如何在僻遠荒服中辨識家園位置？又如何營建家園風景？

對閩籍詩人而言，描述家園的位置，立足京城與身居閩地是兩種不同的觀看視角。當閩人北宦時，家園的位置就在最遙遠的東南邊陲，如翁承贊〈曉望〉所云：

清霜散漫似輕嵐，玉闕參差萬象涵。獨上秦臺最高處，舊山依約在東南。
(《全唐詩》，卷 703，頁 8091)

置身最高權力核心的長安京城，面對雄偉壯麗的宮殿建築群，特別感到陌生而格格不入，獨自登上最高處眺望家園，卻發現故鄉只剩下極其模糊的東南方位概念。對於來自閩地的詩人而言，最難排遣的應是無依無靠、百無聊賴的孤獨之感。再

⁵⁴ 清·董皓編：《全唐文》，卷 567〈韓愈二十一〉，頁 2542。

⁵⁵ 同前註，卷 609〈劉禹錫十一〉，〈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頁 2726。

以孟貫〈送吳夢閩歸閩〉詩為例：

甌閩在天末，此去整行衣。久客逢春盡，思家冒暑歸。海雲添晚景，山瘴滅晴暉。相憶吟偏苦，不堪書信稀。（《全唐詩》，卷 758，頁 8621）

以「天末」形容故鄉的極端邊陲性，有著完全不同於京城的景觀，即使是酷熱的夏日，「海雲添晚景，山瘴滅晴暉」的豐富自然景象，都是詩人深深憶念的大片風景，最後以交通阻絕所造成的「書信稀」，映襯閩人在京的孤寂感。黃滔以〈閩怨〉題材來闡釋閩地的邊陲性，有「妾家五嶺南，君戍三城北。雁來雖有書，衡陽越不得。」（節，《全唐詩》，卷 704，頁 8095）結合鴻雁傳書的人情連繫，與衡陽歸雁的候鳥生態，把嶺南與塞外切割成沒有交集的兩個世界。至於與閩地緊密連結的大海，黃滔〈賈客〉云：

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全唐詩》，卷 704，頁 8094）

相對於五嶺的阻絕性，閩地的海上交通顯然更具開放性，惟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權衡，海上連結所開啓的境外互動，並不為閩人所普遍認同，因而詩人筆下的故鄉，仍有相當程度的封閉性。

由上所述，無論是天險屏障或人為思考，閩地都顯得封閉而獨立一方，也因此而得以建構自足於邊陲的一方居所，如黃滔從兄黃蟾〈和從兄御史延福里居〉所云：

天賜平安水北中，滿庭荊樹醉春風。縱覺塵世三公貴，何似吾家一脈通。
花底輕風香撲散，門前細柳綠皆同。回頭文館長安上，此際思予甯有窮。

56

站在京城所看到的閩地是僻處東南的「天末」，一旦回歸閩地，所見盡是故鄉的水澤土膏、良辰美景，更以家庭和樂抗衡三公顯貴，以家家戶戶同沐花香、共享綠

⁵⁶ 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 252。

意，對照出長安京城的爭權奪利、名疆利鎖，最後以一句「此際思予甯有窮」，使東南窮海成爲京城人士嚮往的人間樂土。

由此來看閩人身居家園所書寫的故鄉風情，終身不仕的黃子野，在〈扣舷歌〉二首描繪出閩地的風情畫：

早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
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臥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

57

閩地的一天，就在江流入海與海潮拍岸的激蕩中拉開序幕，漠漠彤雲、浪捲千堆雪的壯觀海景，彷彿一百六峰的崇山峻嶺都要被吞沒。面對山海交相掩映的浩瀚風景，對於「人」的存在，黃子野以不知何處、無尋處、醉不醒、臥滄溟、坐獨聽等措辭，形塑出「人」消融在自然界的無有無爲而自在。在歐陽詹筆下，閩地又是處處都可入畫的美景，如〈晚泊漳州營頭亭〉云：

迴峰疊嶂繞庭隅，散點煙霞勝畫圖。日暮華軒卷長箔，太清雲上對蓬壺。
（《全唐詩》，卷 349，頁 3919）

即使是泊舟之處，縱目所見，大片天然的迴峰疊嶂，隨風流動的散點煙霞，是人工畫圖所描繪不出的風光勝景。捲簾憑軒眺望餘暉掩映的大海，彷彿置身仙境，與蓬壺連成一片而消解了人間天上的界限。再以杜荀鶴〈閩中秋思〉爲例：

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葉聲。北畔是山南畔海，祇堪圖畫不堪行。
（《全唐詩》，卷 693，頁 7978）

溫暖濕潤的氣候，即使到了秋天，完全看不到秋氣肅殺的凋零景象，紫菊盛開的茂密鮮妍，以及南方特有的紅蕉，在風弄闊葉中提供了視覺與聽覺的雙重享受。至於被視爲阻絕閩地交通而「不堪行」的山和海，在安居家園時，反而成了一幅幅天然卓絕的大片風景畫。又如翁承贊（859-932）〈題故居〉詩云：

⁵⁷ 同前註，頁 947。

一為鵝子二蓮花，三望青湖四石斜。惟有嶺湖居第五，山前卻是宰臣家。
（《全唐詩》，卷 703，頁 8090）

曾任京官的翁承贊，細數故居的尋常鵝子、蓮花、青湖、石斜，隨意點染都成興味盎然的詩意。就遊歷歸來的詩人而言，如何放棄京城紛華與功名利祿，選擇安居在東南窮海的故鄉，各自展演出自在無礙的生命光華？晚唐五代的詹敦仁（914-979）在〈勸王氏入貢寵予以官作辭命篇〉一詩中有所闡述：

爭霸圖王事總非，中原失統可傷悲。從來賓主如郵傳，勝負干戈似棋局。
周粟縱榮寧忍食，葛廬頻顧謾勞思。江山有待早歸去，好向鷓鴣林擇一枝。
（《全唐詩》，卷 761，頁 8642）

全詩就政權的興廢更迭發議論，由於京城的核心地位建立在正統的繼承上，以致於爭圖霸王與失去正統成了不斷上演的拉鋸，不論是君臣禪讓的賓主易位，或是干戈流血以爭勝負，都成了歷史迴旋中的一局棋，沒有絕對的贏家。至於身處政權爭奪中的個人，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與經不起三顧茅廬而鞠躬盡瘁的諸葛亮，最後同樣是付出了個人的生命。相形之下，偏遠的古閩越，先有无諸附漢而成爲開閩始祖，⁵⁸詹敦仁乃勸閩王王昶入貢，相當程度地降低了戰爭所帶來的毀滅性破壞。結尾兩句更展現回歸自然的思維模式，以莊子「鷓鴣巢林，不過一枝」的典故，建構一個小小的詩意家園，以寡慾少求而獲得生命的寧靜自在。其〈留侯受南唐節度使知郡事闕予爲屬以詩謝之〉更具體寫出：

晉江江畔趁春風，耕破雲山幾萬重。兩足一犁無外事，使君何啻五侯封。
（《全唐詩》，卷 761，頁 8643）

只要能跳脫政治權勢利益的誘惑與拘限，以最素樸的躬耕自食，就可以獲得心靈的無限欣豫。詹敦仁在政治場域的功名富貴之外，結合大地美景與簡單勞動，就可以輕鬆擁有詩意棲居的家園。其後又有詹琲勸陳洪進納土歸宋，使生民免於戰

⁵⁸ 无諸又作無諸、亡諸，班固：《漢書·高帝紀》有詔封爲閩粵王，王閩中地。（卷 1，頁 53）

禍之苦，有〈追和秦隱君辭薦之韻上陳侯乞歸鳳〉詩云：

誰言悅口是甘肥，獨酌鵝兒嗽翠微。繩利薄於青紙扇，羊裘煖甚紫羅衣。
心隨倦鳥甘棲宿，目送征鴻遠奮飛。擊壤太平朝野客，鳳山深處□生輝。
(《全唐詩》，卷 761，頁 8643)

詹琲雖有保全閩境之功，不求世俗的功名榮華，歸隱鳳山，尤以「心隨倦鳥甘棲宿，目送征鴻遠奮飛」二句，寫出盛世歸隱的志向，有嵇康〈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的「俯仰自得」、「得魚忘筌」之意，⁵⁹因而能以「擊壤太平朝野客」自期，雖處深山而無絲毫枯寂之感。從无諸到詹琲，亦可見閩人在政治場域之外，另有其百姓生存權的考量，以及甘老林泉的生命具足光輝。

特別一提的是宗教在閩地的安頓與開拓，有百丈懷海(749-814)〈禪門規式〉所強調的因地制宜、自給自足與無求自在，實踐「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並重的生活，⁶⁰對禪宗的永續發展有關鍵性影響。而修道的譚峭，有〈大言詩〉云：

線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
(《全唐詩》，卷 861，頁 9732)

譚峭取《維摩詰經·不思議品》所云：「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從本質上說超越，消融極大與極小的對立，建立自我主體的圓滿自在，自然可以無執無礙。至如孟貫〈贈棲隱洞譚先生〉所云：

先生雙鬢華，深谷臥雲霞。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石泉春釀酒，松火夜煎茶。因問山中事，如君有幾家。(《全唐詩》，卷 758，頁 8620)

⁵⁹ 逢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魏詩》，卷 9，頁 483。

⁶⁰ 宋·釋普濟，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記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遍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卷 3，頁 136。

除了個人的自在逍遙，山中生活的自給自足，特別是「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的愛物護生之情，形塑出人與自然共存具足的樂境。相對於邊塞詩人努力在西北絕域複製中原生活模式，⁶¹閩人顯然更能以珍惜故鄉的海山與花木，在荒服中營建出閩地特有的家園風景。

（三）以詩書耕讀形塑的家居生活

閩人在荒服中所營建的家園，除了珍惜自然資源而使海山險阻成爲大塊風景，在人文發展上突破「不樂北宦」的初衷，既爲北宦而勤讀詩書，惟最終仍是返鄉安居，由此形塑的家園意象，並未引進京城居室的比屋豪華、峨峨高門，反而呈現醉心詩書與林泉的逸興，成爲閩地極獨特的家居風景。閩人最早及第而徒步東還的薛令之，有〈靈巖寺〉詩云：

草堂棲在靈山谷，勤苦詩書向燈燭。柴門半掩寂無人，惟有白雲相伴宿。
（《全唐詩》，卷 215，頁 2248）

在現實條件上，草堂、山谷與柴門的物資匱乏，是邊陲鄉野的普遍住屋景象，詩人依寺棲居，更顯寥落，而一經挹注「詩書」與「白雲」的精神內涵，就形塑出鄉居的勤苦貞定與寂寞淡然興味。此後詩學工夫就成爲閩人用力所在，如王魯復〈詣李侍郎〉云：

文字元無底，功夫轉到難。苦心三百首，暫請侍郎看。（《全唐詩》，卷 470，頁 5346）

未仕前的文字功夫，全擺在詩學上頭。在求仕的過程中，詩名的重要性，如朱慶餘〈送顧非熊下第歸〉所云：「但取詩名遠，寧論下第頻。」（《全唐詩》，卷 514，頁 5869）只要詩名遠播，及第就是遲早的問題。至於京官入閩，也以詩爲主

⁶¹ 在閱讀詩人浪跡西北絕域的作品時，注意到詩人雖然身處邊陲，仍以複製中原的生活模式來安頓家居，以邊塞經歷豐富的岑參為例，其〈優鉢羅花歌序〉即自言：「自公多暇，乃於府庭內，栽樹種藥，爲山鑿池，婆娑乎其間，足以寄傲。」（節，〈《全唐詩》，卷 199，頁 2062〉），藉由維持原有生活模式，消解異域他鄉的孤寂感，也就難以融入當地或對當地產生作用。詳見註 1。

要的交接載體，如馬戴（799-869）〈送李侍御福建從事〉詩云：

晉安來越國，蔓草故宮迷。釣渚龍應在，琴臺鶴亂棲。泛濤明月廣，邊海眾山齊。賓府通蘭棹，蠻僧接石梯。片雲和瘴濕，孤嶼映帆低。上客多詩興，秋猿足夜啼。（《全唐詩》，卷 556，頁 6453）

即使到了晚唐，宦閩的境外詩人所描繪的閩地，仍是停留在閩越國的歷史殘遺、海山交錯的低度開發地區，所見無非蔓草、亂鶴、大海、瘴雲、孤嶼、蠻僧、石梯與秋猿等邊陲景物，結語提出屬於官府的蘭棹與詩興，就成為任職荒服中的京城文明指標。

特別要指出的是，歸納一百多位閩詩人中，主要集中在晚唐，蓋閩人北宦起步已晚，又僻處東南邊陲，當晚唐許多勤苦學詩的閩詩人，北上展開遠遊學仕的他鄉歲月，「詩」自然成為明志、交友的主要載體，卻發現「詩」的輝煌時代已然不再，以詩賦取士、以詩應制應教、以詩相知相許等出閩前的聞知，出閩後的所見所遇出現許多落差，考驗著閩詩人對「詩」的期待與失落，如林寬〈下第寄歐陽瓚〉云：

詩人道僻命多奇，更值干戈亂起時。莫作江寧王少府，一生吟苦竟誰知。
（《全唐詩》，卷 606，頁 7000）

林寬以「詩」應世，竟落入冷僻而孤寂無偶的境遇，仍堅持以「詩人」自許，以承擔辛苦的自覺，細數詩人的道僻命奇，除了一生苦吟的江寧王少府，又如〈哭棲白供奉〉的「琢詩方到骨，至死不離貧」（《全唐詩》，卷 606，頁 7002），明知詩道已喪，卻更著力結交相濡以沫的詩人朋友，如〈送許棠先輩歸宣州〉：

髮枯窮律韻，字字合墳簞。日月所到處，姓名無不知。鶯蹄謝守壘，苔老謫仙碑。詩道喪來久，東歸為弔之。（《全唐詩》，卷 606，頁 6999）

唐末戰亂頻仍，盛世詩歌風潮不再，林寬乃藉由不斷記憶謝朓、李白、王江寧等詩人姓名，意圖重構久已淪喪的詩道，並與許棠相約「髮枯窮律韻，字字合墳簞」，共期窮畢生之力於詩歌創作上。其〈酬陳樵見寄〉更具體刻劃詩人生活：

失意閒眠起更遲，又將羈薄謝深知。囊書旋入酒家盡，紗帽長依僧壁垂。
待月句新遭鬼哭，尋山貌古被猿窺。元和才子多如此，除卻清吟何所為。
(《全唐詩》，卷 606，頁 7001)

囊書求仕，卻只能失意地轉徙於酒家與僧舍，與鬼魂猿猴為侶，惟一自恃的是永不放棄的新句清吟。林寬除了以不斷記憶詩人來強化詩道信念，即使是方外之士，也以詩相契，如〈送僧遊太白峰〉所云「出定更何事，相逢必有詩」(《全唐詩》，卷 606，頁 7003)，詩的媒介不但跨越僧俗，更以詩辨識歷史人物，如〈歌風臺〉云：

蒿棘空存百尺基，酒酣曾唱大風詞。莫言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盡解詩。
(《全唐詩》，卷 606，頁 7001)

對後人而言，劉邦〈大風歌〉所映現的英雄氣概，顯然比漢朝開國君王的身分更具親切性，由此而使詩人角色凌駕在帝王之上。其〈長安即事〉乃云：

暝鼓纔終復曉雞，九門何計出沈迷。樵童亂打金吾鼓，豪馬爭奔丞相堤。
翡翠鬟欹釵上燕，麒麟衫束海中犀。須知不是詩人事，空憶泉聲菊畔畦。
(《全唐詩》，卷 606，頁 7004)

唐末長安經歷了黃巢戰亂，來自僻遠邊陲的農民軍打入京城，澈底摧毀了京城的威權建置與奢華景象，面對如此具顛覆性的京城變局，林寬選擇以詩人的身分超越眼前劇變，更以記憶家鄉的泉聲菊畦，作為安頓詩人的歸宿。以詩為載體，林寬重新建構了極獨特的人際關係網絡：除了從南朝到當代的詩人群體之外，僧俗以詩相契，漢主劉邦以詩而入圍，而當代長安權貴則被摒除在詩人心事之外，從而浮現的是講究詩道的故鄉圖象。

久困場屋，年七十餘始及第的曹松，遵循以詩求知的模式而一再受困，對詩的體會尤其深刻，其〈言懷〉自言「冥心坐似癡，寢食亦如遺。為覓出人句，祇求當路知。」(《全唐詩》，卷 716，頁 8224)，可謂傾其所有心力，卻面臨當路者不解詩的困境，如〈書懷〉所云：「吟詩應有罪，當路卻如讎。」(《全唐詩》，卷 716，頁 8224)，以致於詩成了退守山中的憑據，〈山中寒夜呈進士許棠〉云：

山中草堂暖，寂夜有良朋。讀易分高燭，煎茶取折冰。庭垂河半角，窗露月微稜。俱入詩心地，爭無俗者憎。（《全唐詩》，卷 716，頁 8226）

草堂寒夜，惟一的暖意來自與良朋一起讀易煎茶，特別是共同契入的「詩心地」，更是不見容於俗世的孤兀自得。是以當許棠東歸時，其〈都門送許棠東歸〉更直言「舊客東歸遠，長安詩少朋」（《全唐詩》，卷 716，頁 8231），因而有更多獨守山中的日子，如〈山中言事〉所云：

嵐靄潤窗櫺，吟詩得冷癡。教餐有效藥，多愧獨行僧。雲溼煎茶火，冰封汲井繩。片扉深著掩，經國自無能。（《全唐詩》，卷 716，頁 8229）

詩已完全退出應世經國的政治場域，只合山中的詩人與獨行僧，共同品嚐著「雲溼煎茶火，冰封汲井繩」的清冷況味。即使在〈上廣州支使王拾遺〉詩中，仍以「詩窗盛島嶼，檄盾照風雷。幾度陪旄節，營巡海色迴。」（《全唐詩》，卷 716，頁 8229），把詩窗與檄盾並列，成為天末海防署守的一幅獨特風景。

勤苦學詩的晚唐閩人，歷經邊陲與亂世的雙重障礙，被摒於經國用世之外，回歸東南窮海，經營一方家園，乃有其獨特體會。特別是唐末相對於中原的爭霸圖王，閩地主政者主要採取保境安民的策略，如王潮、王審知兄弟及詹琲等人，因而擁有相對安定的生活空間，除了提供中原士民避亂棲居處，閩人更得以肆力經營家居美學，如翁承贊〈書齋謾興二首〉所云：

池塘四五尺深水，籬落兩三般樣花。過客不須頻問姓，讀書聲裏是吾家。

官事歸來衣雪埋，兒童燈火小茅齋。人家不必論貧富，惟有讀書聲最佳。
（《全唐詩》，卷 703，頁 8091）

即使是居官的翁承贊，在家居的經營上，也不講究深宅大院、豪華門第，只是尋常的池塘、籬落與茅齋，惟一辨識家居的標示是讀書聲。而讀書聲也不是官宦人家的特權，在當地，讀書聲已取代貧富而成為辨識身分的指標。這種跳脫以貧富貴賤劃分社會地位的思維，詹敦仁更藉柳樹發揮一篇議論，其〈柳堤詩并序〉對「斷根插地，遂有生意」的柳樹，一反南朝顧悅自嘲「蒲柳之姿，望秋而落」的

習見，⁶²發明柳樹隨地生春而有「刪之則枝葉倍長，剪之則芽蘖滋多」的特質，在生活日用上具有「得以爲負耒息耕之便」、「得以供火爨之用」的「兩資其利」，其民間屬性濃厚。至於缺乏松柏之質的早衰質性，詹敦仁特別從詩人視角加以闡發，云：

時方春也，綠染方勻，柔絲裊風，攪詩腸之百結，宜吾一詠一觴也；春云暮矣，雪絮飛毳，悠揚遠近，嘆人生之聚散，宜閒居而自適也。於是秉耒就耕，書橫牛角，鋤且帶經，或偃息乎繁陰之下，開卷自得，悠然而樂。

柳樹對氣候的敏感度，早春的青青柳條固爲詩人吟詠所寄，暮春的柳絮隨風聚散，秋柳的「改色」而「朽蠹」，更啓發了閒居自適的生命體悟，因而向民間的躬耕靠攏，構設出「秉耒就耕，書橫牛角，鋤且帶經」、「開卷自得，悠然而樂」的耕讀樂境，其詩云：

種稻三十頃，種柳百餘株。稻可供□粥，柳可爨庖廚。息耒柳陰下，讀書稻田隅。以樂堯舜道，同是耕莘夫。（《全唐詩》，卷 761，頁 8642）

文人吟詠的柳樹，與民生物資的稻米，成爲相同位階的民生必須品，結合稻與柳而形塑出耕讀合一的生活模式，既養活了人民的生命，也提升了人民的涵養，庶幾同登堯舜擊壤而歌的樂境。閩詩人在不得志於中原之後，退歸東南窮海，以躬耕讀詩書打造一個自足家園，在唐末爭王圖霸的中原紛擾之外，擁有一個相形安定的詩意生活空間。

五、結語

唐詩成爲必讀經典，在士人學詩與詩學論述中具有權威性與規範性，而典律的形成、轉移乃至重建，又涉及文學、政治、地域與權力等相關論述。漢唐文學

⁶² 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上〈言語第二〉記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顧悅答以：「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頁 65）

傳統係以京城為核心的思維，且如清末陳衍所云：「文教之開興，吾閩最晚，至唐始有詩人。」耐人尋味的是，唐詩接受與典律生成，實與閩地有莫大關係，本文乃以唐代閩籍與入閩詩人作品為討論文本，探討閩詩中所映現的邊陲視野與詩意家園，以作為後續探討閩人論詩及唐詩典律生成的根基。

全文分別從唐代閩宦與閩人北宦的不同視域、唐詩中關涉閩地去來的多重記憶、邊陲視域中的黎元／家園與詩歌四個面向加以探究，特別是閩人北宦與避胡入閩的不同記憶，以及閩人北宦與仕閩者交互映現的閩地書寫，由充滿對「異方」的疏離感，到彼此相激相成、共同騰驤，對閩人的自我定位有很大的啟發。而閩地詩人的邊陲視域，映現在邊陲戰爭中浮現的黎元、在荒服中營建的家園風景、以耕讀形塑的詩意家園三方面，從人民生存權的角度，分別開拓出「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黎元視角，陸續寫下邊陲戰爭「銘功瘞死屍」、「縱饒奪得林胡塞，磧地桑麻種不生」的荒謬本質，更鐫刻成「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閩夢裏人」的最深邃歷史印記。

僻處東南窮海的閩地，先有無諸附漢而成為開閩始祖，入唐而有詹敦仁勸閩王王昶入貢，其後又有詹琲勸陳洪進納土歸宋，使生民免於戰禍之苦，亦可見閩人在政治場域之外，另有其百姓生存權的考量。尤其難能而可貴者，閩人為北宦而勤讀詩書，最終仍是返鄉安居，由此在荒服中所營建的家園，並未引進京城居室的比屋豪華、峨峨高門，乃以珍惜自然資源而使海山險阻成為大塊風景，以躬耕讀詩書打造一個自足家園，有如「斷根插地，遂有生意」的柳樹，成為爭王圖霸的中原紛擾之外的詩意生活空間。

閩人北宦起步已晚，尤以晚唐許多勤苦學詩的閩詩人，北上展開遠遊學仕的他鄉歲月，「詩」自然成為明志、交友的主要載體，卻發現「詩」的輝煌時代已然不再，以詩賦取士、以詩應制應教、以詩相知相許等出閩前的聞知，入京後卻面臨當路者不解詩的困境。而明知詩道已喪，仍堅持以「詩人」自許，藉由不斷記憶謝朓、李白、王江寧等詩人姓名，意圖重構久已淪喪的詩道，更著力結交相濡以沫的詩人朋友，以共同契入的「詩心地」，使詩由應世經國的政治場域，轉向講究詩道的故鄉圖象，從而開啓閩地在唐詩接受與典律生成上的重要地位。

引用文獻

- 王定保：《唐摭言》，《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
- 吳剛主編：《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
- 宋祁、歐陽脩等：《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_____，王希斌點校：《太平廣記》，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 李俊甫纂輯：《莆陽比事》，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
-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辛文房撰，周紹良箋證：《唐才子傳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林寶：《元和姓纂》，《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徐松：《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 張鷟：《朝野僉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梁克家：《三山志》，《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
- 許慎：《說文解字》，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年。
- 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
- 郭璞注，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
- _____，邢昺疏：《爾雅》，《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
- 陳永正主編、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編纂：《全粵詩》，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8年。
- 陳尚君：〈唐代閩籍詩人考〉，《唐代文學研究》第5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 _____輯：《全唐文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陶潛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廖美玉：《回車：中古詩人的生命印記》，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
- _____：〈浪跡窮荒——唐代詩人的邊境書寫與天下想像〉，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編：《詩話學》第11輯，2012年6月，頁165-194。
- 劉知幾：《史通》，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 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劉海峰：〈唐代福建進士考辨〉，《集美大學教育學報》第2卷第1期，2001年3月，頁20-24。
- 劉義慶撰，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7年。
-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
- 鄭杰輯，陳衍補訂：《閩詩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鍾嶸撰，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1992年。
-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釋普濟，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The Horizon of the Frontier and People's Homeland in Min Poetry during Tang Dynasty

Liao, Mei-yu*

[Abstract]

The essay would focus on four dimensions. First, it area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etween officials work in Min and also Min people work in the capital city during Tang dynasty. Second, it elaborates the complicated memory of Tang poetry associated with the coming and going in Min area. Lastly, it illuminates the people/homeland and the poetry in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frontier. Above all, it emphasized on the different memory in Min people who work in the north, and also the people who move to Min area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the barbarian. These two kinds of writers not only confront but also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se inspire to create Min people's self identity. As for horizon of the frontier in Min poetry, it displays in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e people live in the wartime frontier, which is from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o exhibi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on people. Second, the homeland built in the remote place, which is constructed from protecting natural resource into a magnificent landscape. In the meantime, it creates a poetic space by reading, being self-contained by farming and in the end becomes a unique space away from the chaos in the capital of the country.

Keywords: Min Poetry, Backcountry, Horizon of the frontier, Common People, Homel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